

档案与北京史

国际学术讨论会

论

文

集

下

北京市档案馆
编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ON ARCHIVES
AND BEIJING HISTORY

中国档案出版社

档案与北京史 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市档案馆 编

(下 册)

中国档案出版社

目 录

论北京近代学堂的兴起·····	韩宝华 (1)
变革与融合——近代教育转型中的京师	
私塾改良·····	梅 佳 张天宇 (7)
走向中国化与世俗化的汇文中学	
(1927年前后) ·····	王 星 杨大业 (23)
1935年北平市政府的中学男女分校令和新设	
市立第二女中 ·····	[韩国] 池贤娜 (34)
基督教会、洛克菲勒财团与北京协和医学院·····	赵之恒 (57)
近代北京公共卫生之考察——20世纪初期的中国	
“国家卫生” ·····	[日本] 饭岛 涉 (68)
明清北京太庙与祭祖文化研究·····	秦国经 (78)
近代北京工商行会与传统宗教·····	习五一 (99)
近代以来北京地区会馆的衰落——以广东会馆为例	
·····	刘正刚 (130)
李鸿章与北京安徽会馆 ·····	杜春和 (151)
北京安徽会馆沿革述略 ·····	王灿炽 (162)
档案与京剧史研究 ·····	张燕鹰 (172)
北京南城与京剧 ·····	王 丹 (184)
清代宫廷御膳研究 ·····	刘耿生 (199)
北京门礅初探·····	[日本] 岩本公夫 (216)
北京近代城市文化演进历程与构成特质论略 ·····	胡光明 (240)
北京城市文化的政治性——与天津城市文化之比较	
·····	王兆祥 (265)

当代北京书店业 50 年的发展述略 郝志群 (279)

清代圆明园八旗驻防的设立及其户口演变与户口特征

..... 韩光辉 (290)

清末民初北京的外来人口研究 袁 熹 (301)

民国初期北京的社会调查 吴建雍 (318)

现代卫生示范区的建立与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

..... 杨念群 (332)

民国时期北平的禁烟禁毒 黄 仪 方立罪 (345)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市民社会观念变动评析

..... 江 沛 姬丽萍 (363)

北京女性史研究述评 刘宁元 (382)

当代北京妇女报刊研究 刘宁元 (397)

北京书店业现状调查与分析 宋卫忠 于丽萍 (420)

北京的民俗与民族 赵 书 (430)

北京民俗与中国文化 黄宗汉 (438)

从档案等看清末民初北京的民风民俗 叶志如 (447)

民国时期北京风俗西化初探 安清福 (467)

圣城北京 [荷兰] 施舟人 (475)

北京东岳庙的兴建及其社会经济背景 袁冰凌 (477)

石刻史料的档案价值——从北京白云观的石碑

看白云观的历史 [法国] 翼宸翰 (489)

盛清北京与中西文化交流 [加拿大] 陈捷先 (494)

北京地区基督教史迹与文物 吴梦麟 熊 鹰 (511)

明清时期的北京教堂与中西文化交流 冯佐哲 (520)

明清以来北京教堂文化的演变与特征及对北京

传统文化的影响	佟 洵 (534)
北京汉学研究所与中法文化交流	窦 坤 (550)
《北京市志稿》宗教卷述评	王 岗 (560)

论北京近代学堂的兴起

韩宝华

当我们在世纪之交回顾中国近百年来的巨大变化时，教育变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而在中国近代教育的兴起过程中，北京近代学堂所起的作用则尤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教育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最终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同时，教育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中最基础、最重要的特殊组成部分，其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演变，乃至对整个社会面貌革新的重大反作用也表现得特别突出。教育的进步，意味着一代代人的知识结构、观念形态、思维模式、政治理念将发生变化，而正是这一代代新人不停顿地造就着一个个新的时代。

北京近代学堂的兴起，在当时看来好像是局部范围的个别事件，但实际上，它是中国社会各种复杂矛盾发展的必然要求。正是基于其产生和存在、发展的合理性，因之得以在北京乃至全国迅速推广，虽遇种种阻力，终成不可抗拒之历史潮流。

北京近代学堂兴起的特点，笔者认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被动性

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自唐朝确立后，经过一千多年到封建社会晚期已趋于没落、僵化，但在清末极其保守、腐朽的封建政治体制

下，要想令其主动变革教育制度以适应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发展的需要是不可能的。鸦片战争的失败，已使中国国力、人才的弱点暴露无遗，但清廷仍不思对教育进行些许变革。又拖了二十多年，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迫于与洋人不得不时有所交涉的情势，才勉强在原有封建教育体制原封不动的情况下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

1861年（咸丰十一年）1月，恭亲王奕訢首先提出培养翻译人员的主张。1862年（同治元年）他再次强调：“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①迫于交涉用人之急需，清廷1862年才被动地准设京师同文馆，8月开学。虽然如此，京师同文馆的创设既标志着北京近代学堂教育的萌发，也是北京洋务活动的肇端，其对后来整个中国教育的影响之大，是不以清廷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二、渐变性

1862—1865年初创时期的同文馆，从表面上看，仍然是旧式封建书院，章程依照俄罗斯文馆旧例，差异在于学习内容旧式书院以“诗赋策论时文为尚”，而同文馆则以学习外国语言为主，学习汉文为辅。同文馆设置于总理衙门之下，教员以外人为主，这也是与以往旧式封建书院不同的。

1865—1900年为同文馆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增设了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课程，实行分年授课和班级授课。如1865年设立医学科，1866年开设算学馆，又开设化学课程，1867年设立化学实验室和博物馆，后还开设生理、天文、物理、国际法以及外国史地等。同文馆有专职的教务管理人员，并逐渐采用欧美的一些教学方法。这样同文馆就由一所按封建书院体制创办的以学习西文为主的学堂逐步转变为一所真正具有明显近代性质的学堂，其间经历了近四十年，而且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不小的阻力，如为增设算学馆一

事，洋务派与清流派就争论了半年之久。同文馆演变之慢，一方面反映中国封建教育体制的顽固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新的近代教育在中国的出现终究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近代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在中国的出现，使得学生能够按照计划较为系统地接受近代科学知识，培养的学生也就与旧式书院培养的学生有了根本的区别。

三、依赖性

由于清廷对于创办近代教育完全是被动应急而为，缺乏提前在师资、教材等方面做起码的必要准备，因此，中国的近代教育从开始创办之时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洋人，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洋人所把持。同文馆初设时，洋人教员的年薪十倍于汉人教员。1869年经总税务司赫德推荐聘请美国人丁韪良为总教习，即同文馆第一任校长，一直任职31年，至1900年同文馆停办，同文馆的实权都由赫德、丁韪良操纵。同文馆洋人教员大部分由外国使馆人员、传教士、传教医师等担任，其中一些人并没有称职的学识和教学经验，但都能在中国的学堂充当骨干教习。这种依赖性不仅造成中国近代教育的水平低于欧美日本的近代教育水平，而且其规模也受到极大限制。同文馆创办时学生仅10名，后扩至30名，再扩至120名，这与一个大国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极不相称的。

四、新质性

中国近代学堂的开办不论存在任何弱点与不足，它毕竟是中国在面向西方、面向世界方面跨出了第一步。从京师同文馆开始，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开始向近代学校教育转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人才，一批懂得近代科学的人才，一批大体了解国际情势的外交人才。同文馆所译之书的出版，其影响更加深

远，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来源，有相当部分就是同文馆所译之书。后来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更是前无古人的大事。故梁启超说：“这的确能够替后来打开一个新局面……第三期新运动的种子，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期播植下来。”^②

五、兼容性

在中国创办近代学堂的过程中，存在着科举与学校、中学与西学的斗争与冲突，也有一个是全盘西化还是使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经过改造、扬弃、融合后仍在近代教育中保留一定地位的问题。应当说，在这个问题上虽然顽固派保守思想的阻力对防止全盘西化客观上起到一定作用，但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及改良派人士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和宝贵价值，是从理性上不能完全抛弃传统文化的內因，而这一抉择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的面貌，都是关系极大的。

1887年清廷将近代科学列为候补官职者的考试项目之一，1896年刑部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1898年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提出废科举、兴学校的主张、直至京师大学堂的设立，均强调学贯中西，而非全盘西化。京师大学堂的办学方针为“中西并用，观其会通”，这对后来中国的教育格局乃至文化、政治的发展，均有重大影响。

六、中心性

与沿海等外地相比，在北京完全由洋人办的教会学校出现较晚，数量较少，完全由地方洋务派办的实业学校、武备学校也同样出现较晚，数量较少。北京的近代教育始终与国家的政治、法统等问题有较多的较直接的关联。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在“公车上书”这个中国资产阶级首次提出的政治纲领中,就包括要求改革科举制度、创办新式学堂、造就变法维新骨干力量的内容。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统筹全局折》中,提出制度局下立十二局分管诸事,其中有“学校”一局。同年五六月间,康有为又上《请开学校折》,急催在京师设立大学。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宣布变法,二百余件诏书涉及18个方面,其中包括废八股,改试策论:各省书院、祠庙改设学堂;办学堂,京师设大学堂,省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堂等三个方面。

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8月9日正式成立,孙家鼐为第一任管学大臣。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最早的近代大学,而且在创办之初还兼有全国教育行政机构的职能,总理全国各省学堂事务。在新旧教育体制的转变中,北京作为全国教育中心的地位不但没有减弱,而且更加增强了。虽然到1904年后专设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大学堂总监督仅专管大学堂事务了,但从学术地位上看,由于第一流重要近代学堂均处首善之区,从而使北京作为近代中国教育中心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1897年初张元济等开设的通艺学堂1898年秋并入京师大学堂,1900年停办的同文馆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更增强了京师大学堂首屈一指的地位。

北京近代学堂所以取得全国教育中心的地位,除政府赋予其特殊职责、给予其特殊重视外,综合性和群体性的形成也是重要因素。如京师大学堂到1910年大学正科已调整为7科13门,学制除商科为3年外,其余均为4年,课程设置除文学科有经学、理学、诸子外,其余学科全是近代新学科,初步具备了近代综合性大学的规模。

1902年京师大学堂附设有师范馆,1904年改称优级师范科,1908年独立设置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此外,1907年设立回文师范学堂,1908年设立女子师范学堂,使北京近代教育中的师范教

育有了较完善的结构、较良好的基础。

1909年美国以“退还庚子赔款”名义成立游美学务处，1910年招考第二批留学生，录取70人，同时还录取预备生143人，在清华园设游美肄业馆。到1910年12月，因游学肄业馆分设高等和初等两个学堂，学生名额也扩大到五百名，入学目的也不再仅限于游美一途，遂定名为“清华学堂”。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为便于学生留美时与美国高等教育衔接，全部采用美国高等初级学校教材及其教学方法。在此前后，北京汇文大学、外文学堂、高等实业学堂、贵胄学堂、法律学堂、政法贵胄学堂等高等学堂及一大批新式中学堂、小学堂亦随之兴起，使北京近代新式学堂数量和学生人数均占全国各城市之首，为北京是整个近代乃至现代的全国教育网络中心的地位奠定了基础。^③

总之，在清朝灭亡之前，本来作为补救清朝统治之重要措施而兴起的北京近代学堂，却为加速清朝的灭亡创造了条件。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1912年5月北京临时政府将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正式取代了封建旧式教育，其对中国近代乃至现代的影响都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北京近代教育兴起对中国文明影响之大，对中国变革影响之深，是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的。

注释：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1册，第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②《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8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③参见《北京通史》第8卷，第376页，中国书店，1994年版。

变革与融合

——近代教育转型中的京师私塾改良

梅 佳 张天宇

自隋唐以来,我国一直在不断地巩固和发展科举制度。不可否认,科举制度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对于促进教育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从近代以来,这一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袭并维持千百年的教育体制,使得整个社会教育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封建教育正是以其为核心,维系全国教育的统一。在这一时期,私塾成了此种教育体系中最基础的维系支撑部分,就像血液对人体一样,私塾不断地为封建王朝提供可用人才,也正是全国各地数百万计的私塾支撑着整个封建统治下的人才结构金字塔。面对清末西方思想文化的不断冲击和影响,初等教育逐步走向系统化、正规化已成为历史必然,私塾因此遭受强烈冲击,它也必然为自身发展寻求出路。

在20世纪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伴随着传统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的演变,京师私塾的被冲击以及在这种冲击下所发生的质与量的变化表明,作为封建教育的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私塾教育,在逐步走向甚至融入资产阶级大社会化教育。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私塾教育的变革并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表征,而是封建传统与资本主义思想法则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像我国的教育思想在这一时期、在新旧两种势力夹击中摇摆不定一样,政府对私塾的改革也处于一种观点立场相对混乱的状况,但观其总体发展,还是有进步的发展轨

迹可寻的。本文以京师私塾作为主体进行论述，是因为北京在中国历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北京在这场私塾改良过程中首当其冲，被作为示范之地，相对与其他城市如上海、广州等地私塾来说，所受冲击是最大的，产生的效果也最为明显。因此，我们仅以京师私塾在此次重大变革中所受冲击及政府的相应行为为例，根据北京市档案馆馆藏相关档案及资料，阐述这一变革产生的背景、政府行为、京师私塾的演变发展三个方面的问题，试图涵盖和解析当时私塾变革中主要存在的一些现象及其内在的原因。

政府对京师私塾进行整理改良的时代背景

清末民初，是我国政坛纷芜繁杂、剧烈变化的时期，针对教育而言，同样是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行径的不断扩大及其程度的不断加深，清王朝统治的无能与腐朽暴露无遗。强烈震惊之下的进步人士，从西方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感受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与发达，认为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富国强兵。这是近代中国要求改革封建教育的先声。德国诗人海涅有一句名言：“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向前再推进一步”。20世纪前后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导致了支配中国两千多年的教育思想发生相应的变革，旧有的思想意识形态结构在越来越猛烈地冲击之下不断瓦解、崩溃，而新的教育思想模式在逐渐形成和完善。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便是其被迫对教育体系实行改革的典型标志。针对当时诸多教育家认为教育是人类一项极其复杂的活动，而中国传统教育最大的缺点就表现在于：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出来的人才基本上缺乏现代国家观念，因此极力要求向发达国家学习取经。由此，当时的政府便以日本明治维

新后确立的教育模式为榜样，希冀通过模仿来达到兴盛的效果。而同时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资产阶级，也在不断地冲破封建桎梏，以教育作为反封建的手段，以新式学堂作为革命的基地，大力兴办教育。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宗旨的确立，即“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纂于纯正，而后以西方论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付国家造就之通才，谨防流弊之意”。^①这一宗旨很明显地反映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一种主要方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既是洋务派的中心教育思想，又是在私塾改良进程中的很长一段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学部成立一年以后，又正式由学部规定了一项更明确的教育宗旨——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五字十条”（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②，是“中体西用”教育方针的进一步延伸，并没有质的区别。在这样的教育思想及其相应形成的教育宗旨的指导下，晚清政府在初等教育方面所做的努力，突出地表现为改良旧有私塾和积极兴办新式中小学堂。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初步建立，对教育提出更新的要求。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两部法令，拉开了改革封建旧教育体制的序幕。统观上述办法的中心内容，其目的在于废除腐朽的封建教育制度，根据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需要来改造传统教育，私塾及初等小学的读经课就是在这两部法令中被明令禁止的，为以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打下良好的基础。1912年9月2日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③，进一步深入地阐释了民国伊始的教育方针，较之清政府所谓“五条十字”的教育宗旨，显然更见其进步意义。“民国的教育宗旨将公民的道德教育当作资产阶级共

和国教育的‘中坚’，在这个‘根本’上，实施富国强兵教育，方能养成人民为国家尽义务的能力”^④，表明新兴的“实用实利”教育思想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这种唯实主义的教育思想在以后的具体教学中突出表现为：教材的浅近切实和教学方式以实物为主体，使得民国时期政府对教育的认知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由此可见，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为满足其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本质要求，而对旧有的封建传统教育的正式宣战，虽然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彻底的现象——这也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所决定的，但从整体上来讲，是较成功的，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对私塾认知观念转变的曲折历程 ——从最初的取缔到整理改良后的融合

对于清政府来说，传统教育已远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要求，为了继续培养为自身服务的合适人才，同时也意图欺骗和麻痹人民的斗志，于是晚清政府被迫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在不断改革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初等教育这个最基础问题的重要。根据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旧有私塾大量陋习、误人子弟的不满情绪，起初意图取缔全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私塾，代之以全国统一的规范化的新式小学堂，以完成教育的普及。然而，由于当时国力所困，晚清政府无力实施这项措施，故而改变初衷，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态度来对私塾进行整理和改革，一方面通过必要的、有效的举措来解决私塾的顽症；另一方面在国家无力创建新式学堂的情况下，进一步解决广大幼童的教育问题。因此，1905年在上海成立私塾改良总会，总理私塾改良的具体工作。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私塾改良总会公布《私塾改良会章程》，在章程中首次表达了这一思想：“顾以中国现时力量及

人民程度而欲大兴教育，广设蒙小学堂，恐无此无量数之经费、亦无此无量数之教员，则莫如先就旧有之数百万私塾而改良之，因势利导，其事较易，其机较顺”。^⑤一个“先就”，就把废除和建立两大难题用一个“改良”加以解决。这亦是晚清政府对于私塾处理的中心指导思想，在此思想下，逐渐发展为改良后私塾相对与新式学堂的融合，将其考核优异者划入正规教育体系中去。这种融合指的是对京城已有千百计的私塾各方面，诸如塾师素质水平、课程设置、教课用书等各项，进行统一标准的评估，成绩优秀获私立小学堂名牌，取得办校资格；并由政府出面运用警法之力量，对坚不服从整理改良及屡教不改者，严厉予以取缔。这种思想在民国初年，仍然是政府对京师私塾整理态度的主要指向。直至1925年以后，政府才由对不合格私塾的取缔，扩展到对当时所存私塾的近乎全部的解散。在此之前，“改良后的融合”思想一直影响着政府对于京师私塾整理的所有政策和措施。这个章程就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的、在全国统一实行的“壬戌学制”，它对近代中国教育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基本上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意志，体现了资产阶级教育改革的基本精神。在初等教育方面，它效仿西方的教育制度，强调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并规定了统一的宗旨、课程、课时等，用新的教学制度、教学方法，否定以往旧式学校长期存在的教育模式。^⑥它的实施，对京师私塾的影响极为深远。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初，京师劝学所开始着手调查城内私塾，在对全局有所掌握之后，督学局拟订《初等小学简易课程》，呈报学部，并通知各私塾试行。其中规定：凡学生不足30名者称“家塾”，30名以上者称为“私立小学”。^⑦这是京师地方首次将私塾与私立小学堂放在同一个层次上来考虑，并把两者的区别界限粗浅地划归为学生的多寡。光绪三十四年《京师劝学所改良私塾办法》中要求“内外城各警区将私塾之地址、塾师姓名、学生人数造册知照内外城各学区”^⑧，试图对京师林立的私塾作一宏观上的了解和

掌握，并要求对塾师资格程度、学生人数、教材用书、房屋条件、教授方法、环境清洁程度等逐一加以改良。《办法》强调每年应对各私塾加以评定，分最优等、优等、中等、下等、最下等五类，“凡最优等、优等、中等者，经督学局长核定榜示后酌予名誉金，发给某学区第几私立小学名牌。凡遵照部定初等小学简易课程授课者，均即认为是改良私塾，其教师素具热诚、力求进益，原遵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之学科教授者果能划清年级、按照程度用学部编定教科书讲授，应请督学局调查认可立案，换给京师第几私立初等小学堂名牌，将来毕业升学奖励与官学一律，以期教育普及”。^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办法充分表明了清政府对私塾的态度，即在总体掌握的基础上对塾师进行劝改，并初步将其优良者划入私立初等小学堂，着重对京师现有私塾进行统一管理，力图使其逐步走向正轨。《办法》较为注重形式上的变化，而不求具体内容上的改革。

正是在这种认识指导下，京师督学局和京师劝学所将私塾改良作为谋求教育普及的途径，1907至1908两年间，改良京城私塾107所，有相当一批数量的私塾被改良为私立小学堂。^⑩与此同时，内外城各学区相继组织设立“私塾改良研究会”，指导学区内的私塾改良工作。^⑪宣统元年（1909年1月11日），京师学务局派员视察内外城改良后的私塾，核定等级，共计改良私塾89处，称为私立初等小学堂。同年10月30日，京师督学局筹办15处优秀私立初等小学堂观摩会，作为全市私塾改良的试点模范加以宣扬。^⑫虽然晚清政府对私塾的整理和改良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努力的，在一些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为民国时期的私塾整理扫清了部分障碍。但从整体上来看，这种整理显然缺乏必要的力度，因此，此时期的改良或称改革只处于最初级阶段，并带有相当浓厚的封建色彩。

辛亥革命后，中国教育制度的演变具有了资产阶级的性质，从而使这场变革得以更深入地进行下去。民国政府提出“凡一国政治之改革，不可以不随以教育之革新，政治在于整理现在，教育在于